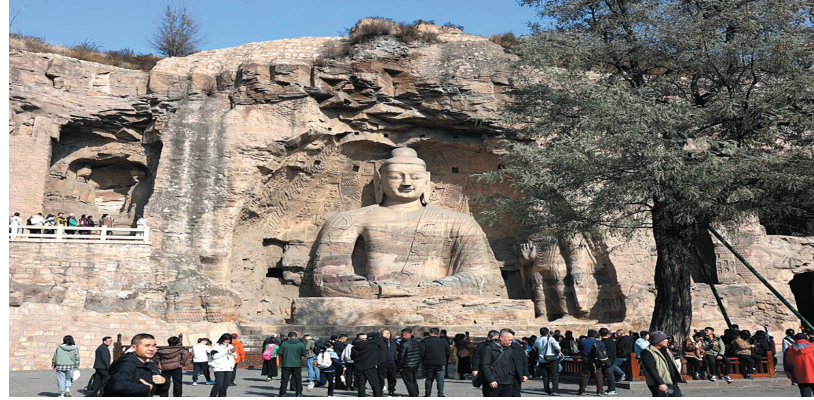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何以上榜“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

本报记者 赵永宏



11月9日晚，携程集团第八届全球合作伙伴峰会颁奖盛典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隆重举行。颁奖盛典上，云冈石窟凭借卓越的文化吸引力与游客体验，成功入选“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云冈研究院下属大同云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荣获“2025 战略合作伙伴奖”。两项荣誉既是对云冈石窟世界级文化价值的国际认可，也为双方未来合作奠定了高起点基础。

那么，云冈石窟何以获得如此荣誉？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坦言，“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将云冈石窟纳入其中，这并非一次偶然的青睐，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是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顶级价值，与古都大同的深厚底蕴在当代世界的必然彰显。“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不仅仅是一个被“打卡”的景点，更是一个能够承载历史叙事、提供深度体验、

并成功完成现代转型的文化现象。

世界文化遗产的硬核实力

云冈石窟的入选，根基在于其自身无与伦比的文化与艺术价值，这些价值早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义予以确认。携程发布的上榜理由显示，云冈石窟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文明交融的‘纪念碑’”：一部石壁上的全球化早期史诗。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王朝，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交流时期。起源于鲜卑族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定都平城（今大同），并积极汲取汉文化、西域文化乃至更遥远的古希腊、古波斯文化养分。云冈石窟，正是这场宏大交融最辉煌的文化结晶。

比如，“昙曜五窟”的雄健与包容：以第16至第20窟为代表的“昙曜五窟”，造像体量巨大，气势磅礴。佛像高鼻深目，肩宽背厚，衣着偏袒右肩，明显带有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然而，其整体呈现的浑厚、雄健之气，又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与力量感。这五窟被视为北魏早期五位皇帝的造像，将皇权与神权结合，体现了政治与宗教的深度融合，是草原文明与佛教思想的完美结合。

再比如，“双轨制”的艺术风格：云冈中期石窟（如第5、6窟，第9、13窟）则展现了更为明显的汉化趋势。窟内出现了仿木构建筑的中国式殿堂龕，佛像的服饰也从印度的袈裟转变为中原士大夫的“褒衣博带”，面容变得清秀、温和。这种从“胡风”到“汉韵”的演变轨迹，在云冈的石壁上被清晰、完整地记

录下来，使其成为研究东亚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进程不可替代的“活化石”。这种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性，正是其能够打动评委的核心所在。

其二，无与伦比的艺术巅峰：“云冈模式”的辐射力。云冈石窟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时期，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云冈模式”。其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单个造像的宏伟，更在于其整体规划、雕刻技艺与空间营造的卓越。

技艺的极致：无论是第20窟露天大佛那穿越千年的慈悲微笑，还是第6窟中心塔柱上繁复精巧的佛传故事浮雕，亦或是第9、10窟前殿屋顶上琳琅满目的飞天、伎乐天，都展现了北魏工匠登峰造极的雕刻技艺。他们将冰冷的武周山石，赋予生命的温度与精神的灵动。

风格的源头：云冈模式直接影响了后续的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甚至远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因此，来到云冈，就如同来到了东亚佛教艺术的“朝圣地”之一，探寻到了其风格演变的源头。对于深度文化旅行者而言，这种“溯源”的体验，具有很深的吸引力。

其三，保护与阐释的现代表达：让千年遗产“活”起来。世界遗产的称号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保护与传承的责任。云冈石窟在这一点上走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列，成功地将学术的、静态的遗产，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动态文化体验。

数字化的永生：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和3D打印技术，云冈石窟实现了“数字永生”。这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更让游客通过VR设备“走进”那些永不开放的犍陀，近距离、无损害地欣赏最精美的壁画与造像。

沉浸式的体验：云冈石窟景区精心

打造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的层次。各地的数字化巡展，光影艺术与千年石刻深度对话，创造出一种震撼心灵的沉浸式美学体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游客追求“出片”与深度体验并重的需求。

古都大同的底蕴赋能

云冈石窟成功入选“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离不开其所在的土壤——古都大同。近年来，大同旅游的火爆出圈，为云冈石窟成为国内外游客必打卡景点，提供了宏大的叙事背景和优越的地理空间。携程展示的“大同旅游底气”让每一位游客爱上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一位网友用“历史的纵深：北魏中华的王者之气”形容他多次来大同旅游的理由。在他看来，大同（北魏平城）作为北魏都城，是其最辉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理解云冈，必须将其置于“帝都”的背景下。云冈石窟并非孤立于野的修行之所，而是“都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当游客漫步于大同古城墙上，远眺华严寺、善化寺的辽金遗构，再前往云冈石窟，便能构建起一条完整的“北魏—辽金”历史感知链。这种从都城到石窟的完整文化叙事，极大地提升了云冈之旅的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完整性。

旅游出行，通过携程订购旅游产品，是大多数游客的选择。在携程网友看来，曾几何时，大同作为“中国煤都”的形象深入人心，灰色的天空是其主要标签。然而，近十几年来，大同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动城市转型，大力治理环境，修复古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今天的“大同蓝”已经成为一张新名片。

当游客乘坐舒适的高铁前往云冈时，沿途所见的不再是煤尘飞扬，而是绿意盎然的生态景观和整洁的城市面貌。这些为云冈石窟的顶级文化体验提供了清新、舒适的“背景板”。

网友“说好去旅行”说，大同市巧妙地将云冈石窟作为龙头，整合市内及周边的旅游资源，打造“大同云冈”旅游圈。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使得大同从一个过路站，变成了一个值得停留2至3天的区域性旅游目的地。云冈石窟带动了整个大同文旅产业；反之，大同整体旅游环境的优化，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云冈作为“必打卡”景点的地位。

遗产价值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此次入选“2026 亚洲 100 必打卡景点榜”，恰逢2025年云冈石窟景区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500万人次的历史性时刻。面对从“旅游目的地”向“文化体验地”转型的关键期，云冈研究院在“保护第一”原则下，构建起“科技+人工”双重保障体系，正是景区文旅服务与体验升级的生动实践，是遗产价值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今后，云冈研究院将结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推进免签政策，以此激活入境游市场，持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云冈文旅公司与携程的强强联合，将围绕云冈石窟这一世界级文化IP，打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产品与更精细的服务保障体系，践行中华文化软实力传播思想，构建全球游客的“中国体验”，共同探索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让千年石窟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这个冬日，当游客站在第20窟大佛前，他们“打卡”定格的，不仅是一尊石佛的微笑，更是一段活着的、仍在被当代人书写的人类文明史诗。

蒙汉民族友好交往之例证

——清代碑刻上的蒙古王公捐善记

贾小中



观音堂西碑，北朝大碑。

云冈石窟东距大同城区15千米，现隶属于大同市四区之一的云冈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以京包线和北同蒲线为界，设立东西大同县，分别隶属于晋察冀边区和晋绥边区，彼时云冈属西大同县。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并建市，隶属于察哈尔省（民国二年设区，十七年改为省）直辖。同年10月，东西大同县合并设立雁北专署。1952年12月，大同市与雁北十三县重归山西省管辖。1953年，云冈石窟划归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云冈曾归属察哈尔，体现了云冈临近内蒙古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区划之变迁。蜿蜒于云冈岭中的云冈路，一直是大同西去晋陕蒙的孔道。下文所提及的清代蒙古王公往来阿拉善和硕特地区时，云冈路为必经之路。

蒙古王公系对清代蒙古贵族的统称，其爵位体系由清廷参照满族宗室制度而设立。通过盟旗管理制度，清廷赋予蒙古王公札萨克职权，以管理旗内行政事务。其服饰遵循清廷品官等级制度。清乾隆至道光时期，重要的蒙古王公部落主要有喀喇沁部、阿拉善和硕特部、科尔沁部。与本文题目相关的主要是阿拉善和硕特部（又称阿拉善厄鲁特），此部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清代属外藩蒙古。阿拉善即贺兰山，该部清初被准噶尔部所迫，后逐步迁居黄河河套以西。康熙三十五年（1696）厄鲁特部骑兵随西路军在昭莫多与蒙古准噶尔交战，三十六年（1697），清朝在阿拉善编佐设旗，授札萨克，并铸给印信，阿拉善和硕特部归属清朝。雍正八年（1730），清廷在贺兰山以西修建了定远营城（今巴彦浩特），次年赐予第二代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阿宝，成为该旗政治中心。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噶尔部被彻底平定，厄鲁特部每次战斗都发挥了重要协助作用。

云冈石窟共有十二通清代碑刻。现存十通碑刻中，有两通碑刻有较多蒙

文，原位置分别在第5窟、第6窟阁楼下西侧。因所在地面水汽经毛细作用上升，致使碑体严重潮湿，极易引发风化损坏，故而约在2020年前后，研究院将其南移至前方过殿屋檐下，以保持碑身干燥。第5窟西侧圆首碑篆文所刻内容与对东面东方首碑汉文内容大致相同，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大佛寺碑记》。第6窟西侧是清光绪二年（1876）《各处宝号募化碑》，碑阴刻有一半蒙文，应与碑阳内容相关联。

蒙古王公的人名出现在云冈山门内东侧、第6窟外西廊、第5窟外东侧位置的三通碑上，以及大同观音堂西廊北侧一通碑上。即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修云冈大路碑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修大佛寺碑记》；及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记述内容包括修云冈大路、修石佛寺、修大佛寺、修观音堂等。碑刻上的蒙古王公官位显赫、爵位尊崇、捐俸丰厚，碑文以顶格表示其身份地位之高贵。我们在阅读一长串王公头衔和名字连在一起的文字时，难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或许大多数汉族民众对北方蒙古族人的名字以及历史官衔、受封爵位等知识了解较少。然而，面对他们曾经的善举，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为民族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的蒙古王公，我们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了解。

云冈石窟1752年修路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罗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1769年修石佛寺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罗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罗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1769年修石佛寺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和硕特额特札萨克和硕亲王之女王多罗格格共施银一百两整”。1861年修大佛寺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和硕特额特札萨克和硕亲王

共捐银四百两”。此外，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载“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五级玛哈巴拉率子乾清门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特贝子职衔头等台吉襄都布素隆施银五十两”。四通碑中提及三位王公和一位格格，即罗布藏多罗济、玛哈巴拉、襄都布素隆和多罗格格。

“御前行走”为荣誉官职，“乾清门行走”是仅次于“御前行走”的荣誉官职。“阿拉善和硕特额特”是蒙古部落名称，“札萨克”是部落军政执政官，“多罗郡王额附”指皇室女子女的蒙古王公驸马，此处指罗布藏多罗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均为爵位名称。庄亲王是“铁帽子”爵位，实行“世袭罔替”，即宗室继承爵位者无需降等，永为一等爵。罗布藏多罗济的福晋（汉称妻子）多罗格格（封号，汉称县主）之父的爵位即为庄亲王。“军工记录四次”“加五级”是军功荣誉记录。

罗布藏（碑文为“藏”，今记载为“桑”）多罗济（1734—1783），为清乾隆时期之人，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三任札萨克。六岁时（乾隆四年），其父阿宝病故，他降袭札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帝命其赴京城与皇子们一同读书。乾隆十五年（1750），他与和硕庄亲王（康熙第十六子）第八女完婚。次年，他同福晋县主（福晋是亲王、郡王正妻，县主是皇族女子封号）回旗掌政。从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他亲率本旗游牧，与清军转战南北，先剿灭北疆准噶尔部达瓦齐之叛，继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之乱，为统一新疆屡建大功，依次晋升为郡王、亲王，并获准“世袭罔替”。战后，他整顿旗政，发展经济，扩建王府，使阿拉善和硕特旗进入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

1752年，时年18岁的罗布藏多罗济与妻子回旗执政的第二年。这一年的5月20日，云冈大路已由寺僧寂容倡议捐善并修筑完成，朔平府左云县增广生员范承基撰写了《重修云冈大路碑记》。此时碑文上刻着罗布藏多罗济已有军功记录四次的头衔，且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查阅史料可知，此时的罗布藏尚未开始参加乾隆皇帝平定西北的战斗，何来四次军功？再看这段文字，字体偏小，与前面规整文字形成反差，尽管后面附有蒙文，但从时间上存在矛盾之处，笔者认为此内容是补刻上去的。到了1769年，罗布藏多罗济时年35岁，《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上记录他为修云冈石佛寺捐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显然此次才是有军功记录四次后的捐善时间，更证实了前面修路碑上的内容是复制文，否则数量怎会如此巧合一致？此时的罗布藏马不仅自己捐银二十七两、马一匹，还与妻子多罗格格共捐银一百两。这通碑的落款人前面是住持僧寂容，与前述《重修云冈大路碑记》中的倡导者住持僧寂容为同一人。寂容和尚或

许对罗王公的捐施极为感激，故而将他的名字再次刻在了之前的修路碑上。

玛哈巴拉（1760—1832），是罗布藏多罗济的次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娶庄亲王第八子辅国公弘融次女，被授多罗额附。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随征剿甘肃回疆起义军，因战功被授“公品级一等台吉”。嘉庆九年（1804），其兄旺沁班巴拉病故且无子，玛哈巴拉继为第五任札萨克和硕亲王，任御前行走。道光六年（1826）后，新疆张格尔叛乱，玛哈巴拉督办驮马数千及大批军需物资支援前线，为平叛作出重要贡献，获议加二级。掌政后，他改革区划、发展经济、修缮庙宇王府、加强城池防卫，使定远营持续繁荣发展。在文治方面亦有成就。

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立石时，玛哈巴拉已病故十余年。碑中记载观音堂自嘉庆年数次募化后“使得金身焕然，但正殿败瓦渗漏，乃工费不吝意，中止矣”。道光六年（1826）“适硕亲王路瞻拜，随捐银五十两且携缘代众善士大钱二百七十千零”。由此可见，碑文记述玛哈巴拉路过观音堂是他去世前六年之事，当时玛哈巴拉66岁，其子襄都布素隆（1780—1844）18岁。由前文所述，道光六年后新疆叛乱，玛哈巴拉督办军需物资，那么碑上捐善记录时间与此次督办军需行动相吻合。

襄都布素隆（1780—1844），为清嘉庆时期之人，是玛哈巴拉的长子，为阿拉善和硕特第六任札萨克。他幼年居住在北京王府，道光五年任乾清门行走，道光十年获赏贝子衔。其父玛哈巴拉病故后，他继为札萨克和硕亲王。他一生崇佛，在任期内对庙宇多有修葺。

清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大佛寺碑记》中，仅有“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特札萨克和硕亲王贡捐银肆百两”，未提及人名。查阅史料可知，此在位的阿拉善和硕特额特札萨克和硕亲王是襄都布素隆的儿子贡桑珠尔默特（1844—1876年在位），他是阿拉善旗第六代七任旗王，在执政的32年中，为清抵御外患、平定内乱、发展经济、社会治理作出了贡献。1861年清政府刚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面积土地，赔偿了大量白银。和硕亲王贡捐的肆百两银按1873年北京大米购买力计算，1.75两银可以买一石（120斤）大米，一两白银约等于现在214元人民币，四百两银相当于现在85600元人民币。同一碑上其他人捐的都是以铜钱单位“文”，1873年2991文可以买一石（120斤）大米，一文约合现在的0.126元。捐铜钱最大的一宗共布施钱壹仟伍佰石（1000文为一吊），约合现在人民币189000元，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善款。

综上所述，阿拉善札萨克亲王第三代罗布藏多罗济、第五代玛哈巴拉、第七代贡桑珠尔默特以及其他蒙古民众，对云冈佛、观音堂庙宇的维修进行了捐款，时间跨度长达近百年，且每次捐款王公数额最多。这显示了阿拉善蒙古王公祖孙四代人对云冈石窟的爱护，对佛教信仰的尊崇，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持续关注与爱护，他们的善举亦成为蒙汉友好互助的历史见证。

“云冈佛”将与“三星堆”相遇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特展”方案正在推进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11月13日，三星堆博物馆与云冈研究院展览工作座谈会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旨在深化双方合作，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特展”落地实施。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朱亚蓉、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学术部研究员罗红、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以及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何建国主持。

杭侃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在考古发掘、保护修复、数字云冈等方面的成果，并阐述了云冈石窟在石壁艺术、历史文化层面的独特价值。他强调，此次展览的主题突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双方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立体造型艺术的发展，既能让观众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也能彰显云冈石窟作为人类共同瑰宝的世界价值。

朱亚蓉表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多元交融、包容

互鉴的生动载体。“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特展”的策展初衷，正是希望让观众深刻体悟中华文明“包容开放、多元一体”的精神内核，感受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希望通过此次磋商，双方能够细化分工、高效协同，确保展览按时面向公众开放，助力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申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红详细介绍了“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特展”的推进方案。展览将以云冈石窟突出的普遍价值（OUV）为核心，通过“重生与再识”“经典与范式”“保护与传承”三个单元，以实物展品与数字化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呈现云冈石窟的千年历史脉络与文化魅力。本次展览预计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至10月31日，在三星堆博物馆四号馆（世界遗产专题展馆）举办。

随后，双方围绕展览整体框架、展陈形式创新、展品构成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与云冈研究院院工作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11月12日，《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与云冈研究院工作交流座谈会在该院多功能会议室举行。《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人员、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以及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青年学者等参加会议。会议由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主持。

《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代表介绍了期刊工作情况及栏目建设成果。《故宫博物院院刊》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多年来始终立足故宫丰富学术资源，聚焦文物考古新资料与学术前沿动态，形成了涵盖古建筑、博物馆学、宗教艺术、文物保护等多个核心领域的栏目体系。同时，期刊坚持内外专家学者匿名审稿制度，既保障了学术质量，也维护了学术的纯正性与公信力。

王雁卿以《创新与实践——关于云冈学建设》为题，系统阐述了云冈学

的创建背景、学科体系与发展成果。云冈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的，集石窟保护、研究、管理、利用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石窟考古与艺术、平城历史和考古、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以及北方砂岩质石窟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传播等多个领域。云冈学当前已建成“云冈学国家重点文物重点科研基地”等多个高端平台，在数字化保护、考古报告编撰、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硕。

随后，双方就后续合作策划专题专栏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双方将以此次工作交流会为契机，通过专栏合作等形式深化联动，持续整合学术资源，创新传播载体，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让文化遗产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滋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为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